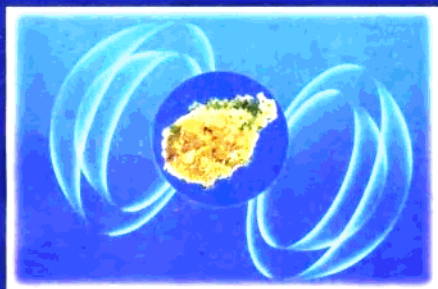


走出“泡沫”

——海南经济发展战略转折



廖 逊 张金良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对海南省情的再认识	7
第一节 发展经济的关键要素是市场	7
第二节 海南省情的重大变化	13
第三节 转向发展生产力	19
第四节 变化中的外部环境	22
第二章 我们九年来的主要成绩	27
第一节 基本思路的回顾	27
第二节 九年来的体制改革	32
第三节 九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37
第四节 外引内联与综合实力发展	43
第三章 前进中的阴影	48
第一节 “海南房地产热”的由来及后果	48
第二节 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其它负面影响	56
第三节 世界形势的制约	58
第四章 历史性的转折	67
第一节 “一枝独秀”的房地产业退热降温	67
第二节 热带农业的兴起	70
第三节 旅游业的发展	77
第四节 工业面临历史性的机遇	82
第五节 “三足鼎立”与主导产业	89
第六节 经济二元化倾向的缓解	94

第五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

社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99
第一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发展问题	99
第二节 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选择	108
第三节 亟待建立的社会主义产权观念	112
第四节 要提倡勤劳—节俭—创业的伦理观念	120
第五节 家庭伦理的重建	125
第六章 战略目标、战略地位和功能选择	129
第一节 跨世纪的战略目标	129
第二节 跨世纪的战略地位	136
第三节 跨世纪的功能选择	140
第七章 跨世纪海南发展战略思路	145
第一节 工业为主导,工农旅并举的产业战略	145
第二节 基础设施先行战略	149
第三节 西海岸中心城市优先开发战略	151
第四节 “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双向型开放战略	152
第五节 建设“海洋大省”的海域开发战略	154
第六节 速度与体制超常规发展战略	156
第七节 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统一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	157
第八章 海南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159
第一节 海南产业结构的现状和特点	159
第二节 海南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的方向和目标	165
第三节 海南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的 实施步骤和政策措施	172
第九章 海南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调整	176
第一节 对海南生产力布局的回顾	176
第二节 海南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调整	179

第三节	各经济区的发展	185
第十章	重点产业的发展	190
第一节	工业——中国新兴工业省的建设	190
第二节	农业——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的建设	199
第三节	旅游业——中国度假休闲旅游胜地的建设	207
第四节	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214
第十一章	海南城市化发展	220
第一节	海南城市化进程	220
第二节	海南城市化发展现状	221
第三节	海南工业发展的区域布局	225
第四节	海南城市化发展趋势	227
第十二章	前景展望	231
第一节	还有没有更快更好的办法	231
第二节	“特别关税区”的来龙去脉	233
第三节	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后找准位置	238
第四节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初步判断	242
第五节	不同的选择与不同的前景	249
后 记		256

导 言

—

1997年初,中央一位高级领导人视察海南,再度重申了他6年前视察时提出的观点——海南的最大优势是开放,海南的改革和发展要围绕开放来进行。与此同时,他特别提出,要研究小平同志1987年决定在海南兴办经济特区的初衷。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邓小平的初衷。因而每谈及这一问题,人们的答案就不免五花八门:

有人说:是为了在海南“造香港”;

有人说:是为了在海南开辟一个全国体制改革的超前试验场;

有人说:是为了在海南增加一个全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有人说:是为了使海南摆脱贫困……

所有这些答案都不能算错,但都不是邓小平的本意。在重新翻阅了有关的一切材料(其中自然包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之后,我们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邓小平在海南兴办经济特区的初衷,是为了使海南的经济发展能够赶超台湾。

为了赶超台湾,就要摆脱贫困。

为了摆脱贫困,就要通过兴办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

为了扩大开放,就要进行比全国其它地区超前的体制改革。与其它经济特区不同的是,海南农村人口众多,工业化城市化程

度甚低,因而更多地接近中国的全国国情,最适宜进行全国改革的超前试验。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邓小平确曾提出过“造几个香港”,我们也确曾有在洋浦及其它地区“造香港”的打算,但这毕竟不是“初衷”。

邓小平的“初衷”是“赶台湾”,“赶台湾”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二

海南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当中,十分少见的贫困落后地区之一,1987年前全岛600多万人口当中,220万低于目前的贫困线,超过了三分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39元(当年价),只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85.1%。经济结构原始,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经济效益低下,资金缺乏,人才奇少,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不稳定。这与在80年代已经同香港、新加坡、韩国并称“东亚四小龙”,一举跃入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台湾,实有天壤之别。

台湾与海南的经济发展差距并非始于50年代,国外和台湾的不少研究人员甚至认为,1945年台湾归还中国时,已经成为中国所有的省份中农业、商业和工业最先进的一个省份。但两岛之间的差距扩大到80年代后期的地步,却是50年代以后的事。应海南建省筹备组之邀制定《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组,对此做过认真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台湾,无论在基础设施,文化教育,还是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都已经有了基础;而当时海南,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离内地时,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带到台湾。其后,美国和日本向台湾大量投资,并给予经济援助。粗略估计,30多年仅美、日向台湾

投资就约为 200 多亿美元。而海南地处国防前沿,长期实行闭关守岛政策,国家对海南经济拿走的多,给予的少,从 1950 年到 1986 年底,累计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仅 89 亿元。毋庸讳言,左的错误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此外,海南一直仅是省属的一个行政区,缺乏自主权,以及岛内行政建制的分割、中央企业自成体系,这些体制上的缺陷也相当严重地妨碍了海南的发展。”

平心而论,在邓小平决定在海南兴办经济特区的 1987 年,中国的经济已经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并一连近十年取得了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早已大大提高。不仅如此,由于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人民终于能够面对真实的外部世界,自由地表达个人见解了。与改革前形成讽刺性对比的是,恰恰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反倒出现了“端起饭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无论是党内党外,会上会下,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批评和责难:“为什么东德不如西德?为什么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为什么内地不如台湾?”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独”思潮也在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进程而泛起。同样是因为我们内地贫穷,害怕我们“共”他们的产,许多本来酷爱中华文化的炎黄子孙,也中了“台独”的邪。

早在 1984 年,邓小平就下决心同台湾进行经济竞赛。他认为老是同印度相比,不足以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赶上台湾才有说服力。但是中国内地辽阔广大,国情复杂多样,即使是将来经济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也不见得每个地方都能赶上台湾。如果拿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同台湾比,似乎又太容易了。最后还是选中了海南,祖国的两个宝岛实行经济竞赛,一旦成功才有说服力。

他最初提出,要用 20 年时间使海南达到台湾当时的发展水

平,即1984年台湾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美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南被称为“不是特区的特区”,享受经济特区的全部政策优惠,争取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加快经济发展。为了全岛统一行政建制,还在广东省,成立了副省级的海南行政区。然而此后3年的实践表明,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对外开放绝不仅仅是个政策优惠与否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体制,没有与外部世界相互衔接的经济体制,再宽松的政策也使不上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邓小平决定在海南创办经济特区,以开放促开发,以改革促开发,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来保证政局的稳定,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使海南经济实现超常规的发展。这既是为了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也是为了祖国统一的大局。因此创办海南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很高的战略着眼点。正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高目标,才给予了我们大政策。

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在海南兴办经济特区的初衷,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建省筹备组制定《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把“赶台湾”的总体战略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步是近期。以1987年为基础,用3~5年时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

第二步是中期。在近期的基础上,再花5~7年时间,赶上全国比较发达地区的水平,提前达到本世纪末原定“小康”水平。

第三步是长期。在2007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美元,即达到台湾1984年的水平。

第四步是远期。再用20年左右的时间,大约在2030年比

全国提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报告中虽然没有正式写入,但我们在讨论时都认为,在全国都达到这一水平之时,海南将要达到当时台湾的发展水平。

《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上述的前三步,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写入了国发 1988 年第 24 号文件。只是在措词上稍加修改,把世纪初达到台湾 80 年代的发展水平,改作“东南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这个改动可能是出于谨慎,但从后来的实际发展来看,也在客观上起到了“模糊”初衷的作用。

四

时间过去了 9 年。随着中央与地方的人事变动,对于邓小平“赶台湾”的初衷,记得的人已不多。然而祖国两个宝岛之间的经济竞赛,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对于“赶台湾”就存在争论。没有人不想赶台湾,包括真正爱国的台湾同胞在内,谁不希望祖国再多几个现代化的省区呢?但是极左思潮盛行时代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太深了,一说“赶台湾”,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大跃进”,就是“超英赶美”,就是必然要失败。所以相当多的同志,宁愿“只做不说,悄悄地赶”。

直到 1992 年,海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19.2%,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设想,人们才有了一些信心。1992 年、1993 年海南经济呈现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此后因国内经济宏观调控而放慢,1995 年、1996 年甚至出现了低速增长的局面。尽管如此,省内经济决策层仍然满怀信心,其表现就是在 1996 年通过的《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

在这一《规划(纲要)》中,海南省提出要在 2000 年赶上国内

发达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八五”时期翻一番,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000 元。而到 2010 年,海南国内生产总值还要比 2000 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 35000 元。按照 1995 年的现汇计算,超过 4000 美元,大大超过台湾 1986 年的人均 3000 美元。可见,尽管“赶台湾”的初衷已被相当多的人淡忘,但人们的信心却比 9 年前更加坚定了。

20 世纪的 80 年代,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最成功的年代。而到了 90 年代,由于经济和非经济的种种原因,台湾经济的发展速度反倒减慢,所以,到 21 世纪初达到台湾 80 年代的发展水平,是海南“赶台湾”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只要我们按照《规划(纲要)》的目标,在 2010 年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5000 元,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一系列的变化,使本世纪的最后几年的经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关键性意义。在所有这些变化当中,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物质生产部门重新又回到海南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心。严格地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海南才真正开始实现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此时距人们热衷寻租,开始偏离这一中心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这个变化的深刻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随着海南开发建设的进程,越来越多的观察家将要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们终会认识到,今后海南经济腾飞的真正起点,正是在这个增长速度放慢、财政收支困难、金融环境不佳、资金极度紧张、人们牢骚满腹、怨声鼎沸的艰苦年代。

因为如此,跨世纪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就是赶超台湾的战略,就是实现海南经济发展走出“经济泡沫”,回到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年代。

第一章 对海南省情的再认识

第一节 发展经济的关键要素是市场

在改革开放开始以前的漫长年代,人们听惯了这样一种说法:我们这个地方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如今又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罪恶制度,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建设,一定会很快就发展起来。

然而过了一年又一年,那个地方的经济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迅速发展起来,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徘徊和停滞。这还不包括“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浩劫和人祸。于是人们开始注意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问题。许多人发现建国初期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热情,终不能长久维持。多数人还是需要依靠“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才能长久地保持劳动积极性。

仅仅重新确认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还是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经济奇迹。姑且不说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都没有那份能力,充分地实施这项至关根本的原则。即便实施了这项原则,仍然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只解决了一个方面的生产要素问题,无论这个要素多么重要,如果不同其它要素结合在一起,照样是孤掌难鸣。把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说成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关键要素的观点,很快就被人们抛弃。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先进地区成功地利用了外资,使经济得到超常规发展的成功经验,使人们把眼光转向了资本。没有资本就没有生产,这个最古老的

原理,终于在中国被重新发现了。接下来就是全国各地竞相吸引外资、竞相为资本的进入创造软硬环境。十几年来,从沿海到内地,从汉族地区到少数民族地区,无一不把吸引国外和省外资本,做为加速经济发展的诀窍。

没过多久,真正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注意到,仅仅靠外来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会促进本地区资本的积累。要为本地民间资本的积累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从良好的社会治安到健全的财产制度,从“藏富于民”的税收政策到“节俭—创业”的精神文明,缺一不可,不在本地形成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尚,外来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谁也不会把钱借给大手大脚的大少爷,谁也不会把钱借给酒鬼,谁也不会向懒汉成堆的地方投资。

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又从国外引进了“人力资本”的新概念,使中华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美德,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道重见天日之后,又增添了新的推动力。不过对“人力资本”的肯定,并非出自对资本的否定,恰恰相反,倒是“知识”和“人才”沾了资本引进和资本积累的光。大批民营企业的崛起,为知识和人才创造了广阔的施展天地,并且以国有企业难以实现的高工资、高报酬,雄辩地证明了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价值。引进资金和引进优秀人才,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切有事业心的各级领导人,朝思暮想的事。这是新中国治国思想史上,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改变。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完。对于实际经济工作者来说,真正有用的理论必须能够说明,怎样才能获得必不可少的国内外资本和优秀人才?为此人们展开过无数次讨论。由于这个问题最初提出于计划经济时代后期,绝大多数论者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各种优惠政策。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有来自政府的好处,才是合法的。没有政府的批准,什么变通措施都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所以至少在历史的昨天,这个结论并不算错。今天的

新问题就在于,我们已经来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时期,政府本身也正在从事无巨细、包办一切的全能角色,逐渐转换成引导、协调、监督全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和枢纽。在这种转换的初始阶段,各级政府尚不得不承担许多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下,本来不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在这个阶段,政府的政策,其中特别是地区优惠政策,几乎可以决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然而这个阶段显然正在过去。事实上政策的地区性优惠倾斜,已经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并不断地变成普惠。这个令各个经济特区头痛不已的变化,事实上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央并没有像有些朋友抱怨的那样,去“回收政策”,而是把原来由经济特区独享的优惠,变成全国共有的开放政策。于是人们开始对政策优惠本身的价值,开始抱有某种怀疑。

大家这才认识到,政策优惠只能是投资软环境中的一个方面。它在 80 年代之所以举足轻重,就是因为当时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所能发生的作用还太小。比如,一直到 90 年代初,许多地方政府事实上还有权自行制定土地使用权的售价。是高价、低价,还是免费提供,都是地方政府说了算。为了争相吸引外资,曾经一再发生过竞相降低地价的情况。基层地方政府一方面以低地价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又靠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收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箭双雕,出两份政绩。在全国各地进行优惠攀比之前,它一度成为几个沿海经济特区的“特权”。然而当全国正式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各地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矩出售土地使用权,巨大的土地投放,就形成了用地一方的“买方市场”,不仅政策优惠不复存在,市场供求的天平也发生急剧失衡。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市场规律。原来“法力无边”的优惠“魔棍”,就突然失灵了。

自从中国经济开始要求融入外部世界,先是要求“复关”,后

是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几年来一直被视为开放改革先行者沿海经济特区,反倒显得不那么积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必然要危及政策地区倾斜的既得利益。1994年全国的财政、金融、投资、外贸、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事实上已经把经济特区的大部分政策优惠“普惠化”。它事实上已经宣布了“地区政策倾斜”的终结。许多经济特区的经济工作者,其中也包括我省的一些经济工作者,对此是缺乏思想准备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如梦方醒。而西部有些省区的朋友,又颇有接过来大做美梦的心态。他们的今天有些像我们的昨天,从来就不愿意认真地想一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政策优惠应该不应该,可能不可能,成为决定其它一切的经济要素?

在全中国和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政策并不优惠,却始终是国际资本投资的热点。比方就东南沿海有许多不是经济特区的地区,没有任何突出的政策优惠,却引入了相当可观的外资。而当今世界利用外资最多的美国,工资高、物价高、地价更高,也谈不上有什么招商引资的特殊优惠政策。更令人吃惊的是印度的班加罗尔,那里水陆交通不便,经常停电,却享有良好的投资信誉。

1992年春天,廖逊一行在访问日本时,曾经向日本的几个最大的财团推销洋浦经济开发区,他们大谈那里的政策如何优惠,大谈那里的地价多么低廉,却很难引起对方的兴趣。后来他们在日商岩井株式会社请教了中国室副室长三浦弘吉先生,对方的一番话令他们终身受益。三浦先生说:投资者最关心的不是成本,而是市场回报。目前我们投资者宁可接受东京银座、香港铜锣湾、北京王府井的高地价,而不愿意被洋浦的低地价所诱惑。因为前者的地价虽高,甚至比洋浦高出几百倍、上千倍,但是那些地方的经济繁荣已经形成气候,地价每天都看长,市场回报更高,而且安全可靠(不过他也声明,近来东京银座情况不

佳)。但是洋浦则不同,那里的开发还没有开始,能不能形成气候尚不得而知,所以你们与其来找我们,不如自己先干出个样子来,能够吸引到的国内外中小企业越多越好,等到你们成了气候,地价再高我们也会来的。他还反复地讲,他并不在乎谁比他们先去,无论是其它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先走一步都无所谓,只要那里成了气候就行。地价低廉只是诸多政策优惠之一,而且同其它一切政策优惠一样,绝对不是能够决定一切的,能够决定一切的只有市场回报,它只存在于市场本身。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推知,为什么我国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那么令外商向往?因为那里虽非经济特区,但综合投资条件比海南好得多。尤为可贵的是,那些地方人口众多,人民越来越富,市场前景广阔,可以预期的市场回报丰厚。

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推知,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引资国?因为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市场回报,美国的地价、工资和物价虽高,但是那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各方面配套设施完善,劳动者技艺精湛,物质生产技术含量大,企业组织科学化程度高,经济产出效益大,尤为重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需求巨大,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推知,为什么班加罗尔会享有良好的投资信誉?因为那里是专门生产计算机软件的,产品附加值高,产品体积小、重量轻,能源供应和对交通运输条件要求不高,只要求高科技人才密集,而这又恰恰是它唯一的长项。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电脑软件生产属于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市场需求量巨大,前景诱人。

在市场需求与供给条件中,市场需求又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如果这个市场确为某一个相对特殊的地区所独有,那么就是供给条件相对差一些,也不要紧。

所以,哪里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哪里就不愁没有资金和人

才。因为只要有足够丰富的市场回报,就不愁引不来资本和人才。资本需要增值的机会,人才需要施展抱负的天地,这两者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引资国?是因为中国的引资政策特别优惠吗?并不是;是因为中国的地价特别便宜吗?也不是;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特别便宜吗?也未必,至少不比越南便宜。中国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大市场。邓小平的富民路线使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富裕起来,持续 18 年平均 9% 以上的高速发展,使 12 亿人民的购买力逐年增大。这一发展趋势正在继续,谁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自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观望了十几年之久的西方大财团纷纷进入。其中真正开始赚大钱的,也许并不在多数,然而这并不减弱它们日益高涨的投资热情。而且所有的大型国际财团,都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一是不急于赚大钱。二是赚到了钱也不急于汇回本国,而是千方百计地挤占市场份额,并随着销售预期的增大扩大生产规模。这正是大财团特有的气派,放长线钓大鱼。

我们说市场更重要,不等于说政策不重要。政策是调节市场的手段,它归根结底要在市场上起作用。在投入产出效益低的时候,多提供些政策优惠,目的是为了补偿投资者,使他们在市场上有利可图,并以此来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在投资环境比较差的地方,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这是我们海南经济特区与其它经济特区相比,最大的特殊性所在。人们总是说,深圳毗邻香港,珠海毗邻澳门,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汕头拥有最富的海外乡亲,那么海南呢?无论是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都不如 4 个老大哥那么优惠。此后又成立了上海浦东开发区,享受与 5 个经济特区相同的政策待遇,但它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其它经济特区不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在 5 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 6 家的引资竞争中,海南从一

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海南比其它地方更加关心政策的变化，倒也合情合理。如果政策优惠能够补偿投资者，海南就能够获得比较多的投资。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同别人一样多的投资。这个道理，在海南全岛上下恐怕没有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政策优惠程度就是一切。因为政策与自然资源、劳动力、专业技术人才和资本，只有在市场上才能起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表面上决定一切的是体现政府意志的政策，但一旦政策本身违反了市场规律，还是要受到惩罚。更何况，如今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体现政府意志的政策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下降成了辅助性手段。对经济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因素，是市场。所以，我们必须把研究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市场变化的研究上。我们对海南省情变化的分析，也就首先应当从对市场的分析做起。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迄今为止有相当多的论者，忽视了对市场变化的研究。在市场对经济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迅速到位的今天，不少朋友仍然把它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全国经济特区与非特区政策优惠落差已经“无可挽回地”缩小，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应当关心市场本身的变化。然而我们的许多朋友还在沿用昨天的工作思路，改不了眼睛向上的旧习惯，除了抱怨就是伸手要。有些朋友甚至认为，研究市场变化是企业家们的事。也许，这正是当今某些特区经济研究人员中，思想方法上的最大误区。

第二节 海南省情的重大变化

作为祖国唯一的热带海岛，海南丰富而独特的自然资源历来为世人所称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推光热资源。

海南平均气温 22~26 度，太阳总辐射量约为 120~140 千